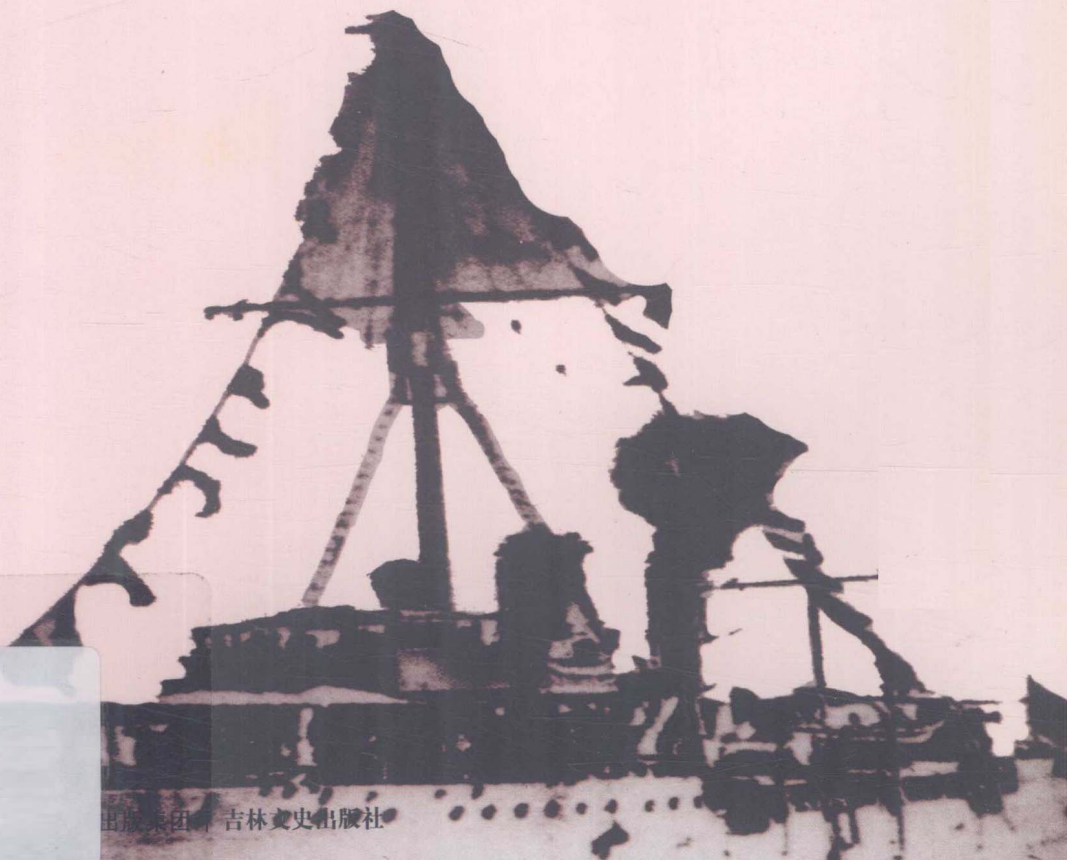


# 红流纪事

## 黄埔风波 中山舰事件揭秘

武国友/主 编 闫文华/著





红流纪事

# 黄埔风波

中山舰事件揭秘

武国友/主 编 闫文华/著



吉林出版集团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风波:中山舰事件揭秘/武国友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3

(红流纪事)

ISBN 978-7-5472-0471-9

I. ①黄… II. ①武… III. ①中山舰事件(1926) — 史料 IV. ①K262.8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305号



红流纪事

黄埔风波

中山舰事件揭秘

HUANGPUFENGBO

ZHONGSHANJIANSHIJIANJIEMI

主 编/武国友

著 者/闫文华

出版人/徐 潜

责任编辑/康迈伦

责任校对/李洁华

装帧设计/柳甬泽 徐 震

印装/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00mm 1/16

字数/79千字

印张/7.5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联系电话/0431-86037516 13578885062

www.jlws.com.cn

书号/ISBN 978-7-5472-0471-9

定价/15.00元

丛书主编/武国友

副主编/王绍强 陈毓述 史义军

著者/闫文华

### 编委会

主任/武国友

副主任/程舒伟 鲁晓红 王绍强

委员/周振华 赵丽君 杨兴朝 徐连英

智金华 殷明星 任曼劼 杨燕华

吴宝林 张宇英 马 铃



## 总 序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走过了长达28年光辉而曲折的历程。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缅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先辈们，我们组织编写了《红流纪事》丛书，以志纪念。

近些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硕果累累，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各类党史著作数以千计。但在已出版的著作中，将一些重大事件独立写成本综合性的小册子，合起来形成一套丛书，目前尚不多见。将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融合在一起，以此为骨架来展现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吧。

选择中共党史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需要做些筛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很多，我们这套《红流纪事》丛书所选之“重大事件”，只选择了民主革命28年历史当中30件大事，力求通过这30件大事大体上涵盖中共党史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这首先就遇到了选取哪些事件最为合适的问题。就我们的水平而言，很难说就一定能够选得那么准确、恰当。但总体设想是，应以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为主，有的也可侧重总结某些历史经验或教训。

在选取事件的过程中，除以上一些考虑之外，经过反复综合、权衡，觉得还应有下列标准：一是体现重要性。也就是说，所选事件要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二是注重代表性。所说的代表性，就是某件事可能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影响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它可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对这样的事件也选取了一些。三是注重平衡性。所说的平衡性有两层意思：其一，处理好事件与事件之间的

交叉。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些重大事件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因受事件独立性的限制，相互之间必须避免重复。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撰稿过程中，通过详略取舍的办法作了一些处理。其二，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中共早期组织，工农运动、军事斗争，国民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地武装起义，各苏区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各大战役，等等，都有所选取，尽量照顾到方方面面。尽管作了上述一些考虑，但由于每一小册子都是以某一事件为中心独立成册的，所选事件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已出版的党史书籍。通过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直书。严格地说，这套书还不算是一套学术著作，而是一套近乎通俗性的读物。努力做到既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又力求文字朴实、通俗易懂，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但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目前这套丛书与我们的初衷还有一定距离，与读者的期望还会有很大差距，我们在此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谅解。当然，也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在此，我们向所有关心此书的同仁、朋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编者

2011年3月于北京

## 目 录

|             |      |
|-------------|------|
| ★ 事件发生前的形势  | 9 /  |
| ★ 事件发生的难解之谜 | 22 / |
| ★ 事件发生的经过   | 50 / |
| ★ 事件发生之后    | 68 / |





## 事件发生前的形势

### (一) 鲍罗廷信任蒋介石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日甚一日。至 1925 年夏秋，国民党内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反革命色彩的右翼”势力，突出的表现就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国民党新右派的抬头，使国共关系变得复杂起来。1925 年 9 月底至 10 月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陈独秀在会上说：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

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他主张中共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牵制”。但是，陈独秀的建议遭到苏联顾问维经斯基的反对。结果，会议通过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现在退出国民党，“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同时，会议也认识到，如果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但不“包办”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左派，而不代替左派。

这次会议之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勾结更加密切了，开始从组织上公开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伦、戴季陶、谢持、邹鲁、林森在北京西山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山会议”，这几个人也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公然指出，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行动与国民党的利益相违背，“盖其加入之意，系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借以维持苏联”。但中苏两国历史毕竟不同，社会状况也有差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不能同时进行。因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一律退出国民党，以便使人清楚地辨认出两党的旗帜。强行合作只会导致内部危机，最终导致两个革命政党的分裂，进而阻止国民革命的发展，所以，“不如分之”。会议还要求解雇鲍罗廷的顾问职务，理由是：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作为政治顾问，利用政治委员会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置于其影响之下，事实上等于国民党组织的解体。因此，非国民党员、客串顾问鲍罗廷不

得在国民党内活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山会议并没有点名批评蒋介石，这或许是蒋介石的全部活动只限于军队，在国民党内部和国民政府里无足轻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西山会议派熟知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并且寄希望于蒋介石反对汪精卫。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共产国际东方部却要求中共妥协退让，主张“中共中央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国民党的工作“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收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维经斯基坚持要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12月24日，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在上海同孙科、叶楚傖举行会谈。双方讨论的内容包括国共关系和国民党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断然拒绝了孙科等人提出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和鲍罗廷离开广州的要求，但同意停止对西山会议派的攻击，也同意在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共产党员所占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

共产国际的决定使中共在国共关系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能退出国民党，又不能打击右派。结果，被赶出广州的国民党右派又被请回来。鲍罗廷得知这一消息后“颇为不满”。他责问张国焘：“为什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尽管鲍罗廷不赞成中共中央的决定，但考虑到中共中央

这样做得到了维经斯基，尤其是共产国际的支持，鲍罗廷只好请示联共（布）中央。

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胜利进军，广东在经历多年的动乱之后终于得以稳定下来。在得到莫斯科的明确指示之后，鲍罗廷约陈延年、张国焘谈话。他首先对广东的局势作了十分乐观的描述：由于工人罢工委员会组织得很严密，香港方面对广东的破坏阴谋没有得逞。而且，美国、日本等国开始同广州进行经济往来。这些情况表明，列强已经承认国民政府业已稳定。有关广东内部状况，鲍罗廷认为已经基本上统一，不会再有叛乱发生了。汪、蒋合作的局面也不会因外界的挑拨而破裂。广西军队同国民政府的关系正处在改善之中，有望成为国民政府管辖的一个省区。所以，广东周围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危害其安全。现在，政府的税收逐月增加，还可望大幅增长。在这种稳定的基础上，民政的整理、军事训练等各项工作，都有望顺利进行。

基于这种乐观的看法，鲍罗廷主张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应该向右派势力发动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而决不应该退让，否则只会助长右派的反共气焰。但考虑到国民党左派力量的脆弱，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左派应该同中共联合起来才能形成雄厚的力量。所以，鲍罗廷开始热衷于汪、蒋合作，并且同这两个人“相处得水乳交融”。

这段时间，蒋介石的言论和行动也迎合了鲍罗廷的意图，因而深得鲍罗廷的信任。11月7日，鲍罗廷在广州发表演讲，强调国共两党的联合。他说，要使国民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唯一的办法就是“革命的同志能联合在一块，如我们革命的力量不能联合在一块，必

不能得到成功”。12月2日，蒋介石得知西山会议的消息后，称西山会议派为“捣乱分子”，认为他们在北京“希图标异”，因而感到“悲惧交深”。蒋介石特意召集各军政治人员和党代表开会，讨论加强国民党团结的办法。他宣称：黄埔军校准许共产党员活动，而且均应公开。他甚至同意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

在公开场合下，蒋介石更是把自己标榜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12月5日，他告诫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下，为实行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他还重申了黄埔军校的校训，希望各位同志“亲爱精诚，不分畛域，不生裂痕”，以完成国民革命的责任，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间接实行共产主义。他声称：三民主义的成功，与共产主义的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中国革命不能不承认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既然中国革命与国际革命不能分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岂有纷争之必要”。蒋介石称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对于共产主义者之同志，敢自信为诚实之一人”。

12月11日，蒋介石在总指挥部宴请苏联顾问。他说：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和革命使命，与本党合作，帮助中国革命的结果。现在有人说，中国革命受俄国人指挥。说这种话的用意，是想污蔑我们革命党。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20世纪了，还有“这种褊狭的思想”。中国革命问题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问题，“若不具世界革命眼光，关起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

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他甚至宣称，即使中国革命受俄国人指挥，但是，只要苏俄诚心诚意帮助我们民族独立和平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我们中国革命党员，只求我们民族独立和平等，也“并不是什么耻辱”。我们实行总理遗嘱，不是在形式上，而是要真正实行遗嘱，“如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俄国革命党，肯负责任，能耐劳苦，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今日在座的几位俄国同志，就是榜样”。因此，“各位如果是有关良心的，马上改过来努力做事，如同俄国同志一样，才可以救中国、救自己”。他还当众高呼：“中俄同志团结万岁。”

12月2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海内外各党部发布《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对国民党新右派进行了谴责。他说，值此广东统一将告完成，北方民众共起奋斗，卖国军阀自行崩溃，总理三民主义即将实现之时，忽有一部分同志离异，自赴北京西山，开其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自行发布议案，驱逐异己，不惜阻挠国民革命大业，“迹其言动，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意旨”。他还批驳了西山会议派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理由，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总理在国民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然后作出的决定，并且经过第一次全国党部大会议决。国民党改组两年以来，“成绩俱在”。西山会议派以“共产党之共产主义，与本党三民主义，根本冲突”为由，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决非总理之意”。西山会议以“共产主义已有蚕食三民主义危险”为理由，开除4名有共产党籍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是一种“怯懦薄弱之心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有24名委员，只有4人是共产

党员，仅占六分之一。如果害怕别人“蚕食”，那一定是“自暴自弃而自振作者”，否则“决不作此奇想”。所谓“赤化”、“共产”、“俄人掌权”等，都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对国民党的诬陷，“今岂将一一出于同志之口耶？”

3天之前，鲍罗廷同《民国日报》记者谈话时表示：“我们倘若想革命都能成功，只有大家联合，互相援助。就是中国同志，要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也要帮助中国革命的成功。”于是，蒋介石宣称，中国革命成功，“则世界革命为之促进，亦世界革命成功”。孙中山提出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唤起民众”，同为完成国民革命所“必须”。苏俄同志帮助中国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针对国民党里有人指责鲍罗廷，蒋介石更是慷慨陈词，他说：“总理曾诏中正‘鲍罗廷同志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问题均须容纳其意见’。总理逝世以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事实，绝无所谓‘包揽’‘专断’之事实。”

实际上，蒋介石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就在东征途中，蒋介石曾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他在会上公开表示，黄埔军校无论如何不能分裂，他要求把在黄埔军校以及军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姓名都告诉他。周恩来以此事关系国共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为由，将此事搪塞过去。后来，蒋介石在同周恩来谈话时还说，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

蒋介石极具“左倾”的讲话确实给鲍罗廷留下了“左派军人”的形象，以至于他确信，蒋介石是“极左派信徒”。鲍罗廷还向伊万诺夫斯基、加拉罕保证：蒋介石是“完全可靠的”。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长当中，我

们同他们“未必有很大的误会”。他们当中的蒋介石、谭延闿、吴铁城和朱培德无可非议，可以同这些军长“一起完成一项大的工作”。

鲍罗廷如此信任蒋介石，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受了恬不知耻的蛊惑宣传的欺骗”，他“在报告中提到的那些政客和将军的每次讲演都充斥着这种蛊惑宣传”。

## （二）鲍罗廷谋划蒋、汪合作

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采取联合中派瓦解右派的策略，向右派发起进攻。但是，鲍罗廷不同意这样做。他担心，如果让戴季陶、孙科、叶楚傖回到广州，他们必然要同左派争夺权力，势必会造成国民党内部的不稳定。这样一来，他与汪、蒋“一同奋斗”的设想就会落空。所以，鲍罗廷主张强迫中派追随左派，要他们无条件地拥护国民政府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他还嘲笑中共中央在上海同孙科、叶楚傖达成的协议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他甚至指示广州的中共党组织反抗上级的决定，认为“广东区委会负责人根据他们对广东情况的真实了解，是可以对这种决定，提出修改的意见”。

张国焘向鲍罗廷解释说，中共中央同孙科达成的协议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联合中派以搞垮西山会议派，就是向右派势力进攻的一种主要方法。张国焘表示，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一致主张建立一种国民政府的制度，而“最低的限度要将汪蒋合作的领导重心，在制度的基础上巩固起来，便可以不受外界挑拨的影响”。